

名著赏析系列

水浒传

与中国社会

萨孟武◎著

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水浒传

与中国社会

萨孟武◎著

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与中国社会/萨孟武著. —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2011. 1

ISBN 978-7-80223-696-7

I. ①水… II. ①萨… III. ①《水浒》研究 IV.
①I207.4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2348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)

电话:(010)66112788 66112758

<http://www.zgsxcbs.cn>

E-mail:sanxiaz@sina.com

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 年 03 月第 1 版 2011 年 0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:4.25

字数:120 千字

ISBN 978-7-80223-696-7 定价:10.00 元

目 录

- 一、梁山泊的社会构造 / 1
 - (一) 阶级基础 / 1
 - (二) 经济生活 / 3
 - (三) 伦理观念 / 5
- 二、“替天行道”的意义 / 8
- 三、杀猪的郑屠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 / 22
- 四、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 / 28
- 五、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陷 / 40
- 六、何以草料场的火烧不死林冲 / 44
- 七、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考察 / 48
- 八、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泊领袖 / 53
- 九、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说到恋爱与结婚 / 59
- 十、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与资本的原始蓄积 / 63
- 十一、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 / 71
- 十二、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到中国古代的政治 / 83
- 十三、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运命如何 / 96
- 十四、由祝家庄与曾头市说到中国
的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 / 103

十五、林冲的地位何以在关胜之下 / 113

十六、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位交椅 / 120

十七、燕青何以能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 / 126

后 记 / 131

一、梁山泊的社会构造

（一）阶级基础

在中国历史上，最有势力的有两种人：一是绅士，一是流氓。绅士由地主阶级出身，流氓则与之不同。

绅士何以有势力？其理由是很显明的。中国是一个农业国，在帝国主义者尚未利用廉价的商品，轰碎万里长城，强迫中国改变其生产方法以前，没有工厂，也没有百货公司，土地是唯一的财产，也是权力的唯一基础。在一个地方之内，谁有最大的土地，谁便是该地的封建诸侯，而有很大的权威。并且在生产技术幼稚的社会，体力又是生产的要素，经营生产的人不但得不到许多金钱，并且劳苦万状。他们工作之余，身体已觉疲倦。他们为了恢复体力，只能把剩余时间消费于肉体娱乐，绝对没有工夫再致力于精神修养，因此，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。反之，地主则利用佃农耕耘土地，他们是有闲阶级，可利用剩余时间，研究各种学问。他们的知识比之一般民众，确实高些。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既是支配者，在文化上又是优越者，他们能够得到一般民众的尊敬，而有相当的势力，是理之当然的。

流氓呢？中国的流氓同希腊罗马时代的流氓不同。希腊罗马时代的流氓乃出身于公民阶级。他们有公权（选举权），他们可利用公权，向国家及富人勒索金钱，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他们在经济上虽然没有直接的机能，然而尚有间接的作用。因为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，一切生产事业均由奴隶担负，而奴隶则由战争的俘虏而来，所以希腊罗马只有不断的打胜仗，不断的扩张领土，不断的侵服领国，而后奴隶的来源才不涸竭。但是要同外国开战，须有军队，而组织军队的人则为公民。因此，他们虽然穷苦，然而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尚有相当的势力。中国的流氓既然没有公权，而在经济上又只有破坏的作用，没有建设的作用，何以他们也有相当的势力？

中国的流氓又和现代的无产阶级（Proletariat）不同。现代的无产阶级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柱，只要他们停止劳动，社会便须根本动摇。反之，中国的流氓则不会劳动，也不想劳动，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，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。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，纵令他们全部灭亡，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，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秩序愈见安定。他们的地位既是这样，何以他们竟有相当的势力？

原来中国的生产是一种“缩小再生产”，因为中国是农业国，而中国的农业却甚幼稚，技术的幼稚已可妨害生产力的发展，而过小地的耕种又可使技术不容易改良。其结果，农民当然没有贮蓄，而致再生产只能在同一规模上，不绝的反覆着。然而地力是有限的，收获是递减的，年年在同一的土地，作同一的耕种，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？收获既然年年减少，数百万的农民遂沦落为流氓无产者，而使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。

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大乱了，而大乱的发起人则为流氓。他们是没有“身家性命”的人，而生活又不安定，生的快乐既未尝过，所以死的苦痛也不恐怖。他们最能冒险，由九死一生之中，忽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。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，而为被压迫阶级，然而他们成群结队之后，就成为大众，可以横行江湖。绅士怕他们捣乱，农民怕他们鱼肉，他们在中国社会上，乃是“化外之民”，隐然成为一个势力。

流氓在中国历史上，又曾演过了重要的角色。他们常常变为流寇，先向最没有抵抗力的农民，肆行劫掠，而使疲敝不堪的农村，连余喘也不能保。农村破产之后，政府因田赋的减少，财政也日益穷匮，不能不用苛捐杂税，来刮索人民，然而一切刮索最后都转嫁在农民身上，结果不但不能挽救国家财政的危险，并且还使农村愈益破产，于是政府成为怨府，终则朝代亦随之而更迭。汉的赤眉黄巾，隋的竇建德李子通，唐的王仙芝黄巢，宋的方腊宋江，元的刘福通李二，明的李自成张献忠，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，朝祚因之断绝，甚者且把整个的中国送给外国人。

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？当然是代表流氓无产者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出身于破落户，没有正当的职业，或在山林“剪径”，或在湖里“揩油”。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，而对于他们“迫上梁山”的环境，亦给与以相当的同情，然而不宜因佩服与同情，而即讳言他们的出身。

（二）经济生活

“有福同享，有苦同受”是他们的口号。“大秤分鱼

肉，小秤分珠宝”是他们的生活。这种口号和生活可以称为共产主义。本来流氓无产者因为自己无产，所以他们若有组织，一定实行共产主义。不过他们的共产主义又和现代的共产主义不同，即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，而只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。在古代，不但流氓团体只能实行消费上的共产主义，便是学者也只能提倡消费上的共产主义。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幼稚，乃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产生这种幼稚的共产主义。何以呢？在古代，工业未曾发展为大工业，手艺人乃个个独立，而成为一种生产上的个人主义，要令生产者合作，非常困难。然而人类的生活条件却很简单，任谁都没有特别的欲望，他们在消费方面，颇能一致。因此之故，遂使古代的共产主义只能取消费形式，不能取生产形式。现在呢？工业已经发展为大工厂制度，在大工厂之内，每一个工人都成为一个轮齿，而和其他无数的轮齿，互相合作。然在他面，生产力的增进又把无数的新物品排在人类的眼前，而增加人类的欲望，纵令劳动阶级，各人也有各人的需要，不能个个一致，即现代工人在生产上虽有合作的精神，而在消费上却表示了十足的个人主义。因此之故，遂令现代的共产主义须取生产形式，不能取消费形式。

梁山泊的共产主义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，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。但是有了生产，而后才配谈共产，他们不是生产者，他们的货财从什么地方来呢？固然他们首领之下，有许多喽罗，他们的经济生活就是筑在喽罗制度之上。但是喽罗又和柏拉图（Plato）的理想国（Republic）中的奴隶不同，不是用“汗”来生产主人的生活品，乃是用“血”来略取主人的生活品。他们的生活既然不依靠他们自

己的生产，所以“仗义疏财”及“劫富济贫”遂成为他们的最高道德。即他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想改变生产形式，而只想劫掠富人的货财，把各种消费品另行分配。这种“劫富济贫”的观念，不但流氓阶级视为最高道德，纵是普通人民也视为合于天理。原来古代财富的集中，就其原因和结果说，都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。现在资本的集中，由于竞争所致，而竞争可以改良机器，并增加大工厂的生产力。反之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因为富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，尤其是利用政治手段，来剥削一般农民；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的。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，须将利润贮蓄起来，藉以添置机器，改良企业，至于个人所得消费的，不过其中小部分而已。反之，古代的富人则没有这个必要。他们利润的来源非在于技术的革新，而在于过度的刮索。他们刮索所得的金钱，均充为个人享乐之用，所以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，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，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。然而这些消费品又不是个人所能消费得完，所以把他分散给大家公用，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，并且还可促进货财的流通。古人以仗义疏财为最高道德，藉此以结交朋友，藉此以增加个人的权力，其原因即在于此。

（三）伦理观念

人类的生活方法，决定了人类的伦理观念。

澳洲土人有杀儿的习惯，并且以杀儿为一种道德行为，因为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，如果生了一个儿子，未到四五岁，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则不但养育无力，并且行走不便，

所以只有把后生的杀死。

美洲土人有杀父的习惯，并且以杀父为一种道德行为，因为他们过的也是游牧生活，而生产力又很幼稚，一人一天的生产，只能维持一人一天的生活。年老的人既然不能随群奔走，而又无法觅食，所以只有把他杀死，使他不受现世的苦痛。

伦理观念随生活方法而不同，而生活方法又随阶级而不同。

绅士生在财主家里，幼有保姆看护，壮有师傅训导，到了长大，又继承祖宗的财产，过其安乐的生活。试问他们的生活何以这样安乐？因为他们有财产。他们的财产从哪里得来？由于祖宗遗留。他们享受现世安乐的生活，不能不回想到安乐生活的来源，既然回想到安乐生活的来源，当然对于祖宗感恩感德，油然而发生一种孝的情绪。绅士以“孝为百善先”，是有理由的。但是祖宗的财产何以不被别人抢去？因为有国家的保护。国家是谁人的国家？“率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国家当然是皇帝的国家。我们现在安乐的生活，由于祖宗的财产，而祖宗的财产所以能够存在，又由于国家的保护，即由于皇帝的保护，则我们为了感恩感德，而须尽孝于祖宗，当然也须感恩感德，而尽忠于皇帝了。

绅士阶级的道德是忠孝二字。

流氓呢？流氓生在穷人家里，他们自呱呱堕地以来，除了母亲的乳汁之外，未尝受过祖宗的荫蔽，有时连母亲的乳汁，还要让给财主的子弟去吸。他们幼年的生活未必比鸡豚为优，因为鸡豚养大了之后，可以卖给别人，其利益是直接的，而儿子有没有“出息”，还是不可知之数。他

们稍稍长大，就帮助父母从事各种劳动，或入山陵讨柴，或到河边捞鱼，或则上街卖油条，家庭的幸福既未享过，对于家庭，当然没有爱情。反之，他们讨柴捞鱼卖油条的时候，为了预防野兽及暴徒的来袭，则当结伴同行。这个时候，朋友是他们寂寞的安慰者，又是他们生命的扶助者。到了他们长大，流浪江湖，朋友的重要更见增加。他们看重朋友，以义气为最高道德，实是环境使然。朋友愈多，则他们的义气范围愈广。超过一定限度之后，很容易由爱惜朋友的义，变为爱惜人类的仁。

流氓阶级的道德是义字，而发扬光大之后，则成为仁。

梁山泊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，所以他们重义而不重孝。孝子王进不上梁山，而最初出现于水浒传的好汉便是气死母亲的史进。（第一回）宋江虽有孝义黑三郎的绰号，（第十七回）但若研究其生平行为，尚不能称为义志。其他的人更谈不到什么孝字。李逵虽然动于孝思，回家取娘，然而半路就送给老虎充饥。（第四十二回）这个事情可谓世上最悲惨的事，然而李逵回山，诉说杀虎一事，宋江竟然大笑，众好汉也没有安慰的话。（第四十三回）假使李逵所取的，非其母，而是其友，则难保梁山泊诸好汉不责李逵谋事不慎。重友而不重亲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，乃是因为他们的伦理观念与绅士的伦理观念不同。

二、“替天行道”的意义

“替天行道”为梁山泊的口号，这个天道观念不但含义复杂，并且性近玄学，我现在只来说明政治上的天道观念，由此以证明梁山泊何以不能得到天下。

原始国家都是血缘团体，而以氏族为基础，雅典国家由三百六十个氏族（Gens）而成，罗马国家由三百个氏族（Glan）而成，古代中国也是一样。这个时候，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，因此，其族长常常成为国家的元首，比方黄帝，他是有熊氏的族长，而有熊氏又是当时最大的氏族，所以黄帝同时又为中国的元首。其他如赫胥氏葛天氏等，都是它们当时的最大氏族。不消说，氏族是由家族扩大而成的，在家族之内，家长须慈爱其子弟，同样，由氏族扩大而成的国家，其元首也须慈善其臣民。家长要统治其子弟，必须立身以正，足为子弟的模范；子弟能够服从，一家就可统一，而有相当的威力；一家能够统一，而有相当的威力，才可以压服氏族；氏族既能压服，那末，当然可以利用氏族的力量，征服别的氏族，而统治国家。这就是《尚书·尧典》所说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民于变时雍”的根据。

这种思想虽然发生于血缘国家之内，但是血缘国家变成地缘国家之后，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。就是他们仍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，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扩大，君主为臣民的父母，臣民为君主的赤子，君主与臣民的关系，无异于家长与子弟的关系，家长须慈爱其子弟，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，所谓“仁政”就是由此而产生的，所谓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也是由此而产生的。

但是国家和家族又有不同之点，在家族之内，父子关系是自然的，父是父，子是子，任谁都不能变更。反之，在国家之内，君民关系却不像父子关系那样的自然，于是又发生了谁是君、谁是民的问题。

人类总喜欢用自己周围的现象，扩充之以观察万物，古代中国人不但用家族现象观察国家，且又用家族现象观察宇宙。家有家长，家长须慈爱其子弟，国有元首，元首亦须慈爱其臣民，同样，宇宙之内，亦有一个主宰，而能慈爱万物。这个宇宙的主宰，中国人称之为天，日月照临，风行雨施，这就是天的慈爱。天是宇宙的主宰。人类社会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所以人类社会本来也受天的支配。不过苍苍者天，不能直接支配人类，必须授命于一人，叫他代天支配，这个人便是天子。天子为天的儿子，代天统治人类。但是天是慈爱的，所以天子必须体天之德，同家长爱其子弟一样，爱其赤子；否则天命不祐，天必剥夺帝位，以另给别人。

万章曰：“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”“然则舜有天下也，孰与之？”曰：“天与之。”（《孟子·万章章

句上》))

但是天不能言，何由知道誰人能够體天之德呢？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”（《尚書·泰誓中》）凡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歡迎，都可以視為受命於天而為天子，所以在上文所引萬章與孟子的對話，又繼以下列文句：

“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”曰：“否，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”曰：“以行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”曰：“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；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；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，堯薦舜於天，而天受之，暴之于民，而民受之，故曰：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”曰：“敢問薦之于天，而天受之，暴之于民，而民受之，如何？”曰：“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，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故曰：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為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，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，而之舜；訟獄者，不之堯之子，而之舜；謳歌者，不謳歌堯之子，而謳歌舜，故曰：天也，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。”《泰誓》曰：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此之謂也。”（《孟子》同上）

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”（《尚书·泰誓下》）在中国历史上，君主因受百姓的反抗而致失去天下的，不知许多；匹夫因受百姓的欢迎而能得到天下的，也不知许多，所以聪明的人常能体天之德，施惠于民。汉高祖明太祖便是其例。

（汉高祖入咸阳，）召诸县父老豪杰曰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诽谤者族，偶语者弃市……吾当王关中，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，余悉除去秦法，诸吏人皆安堵如故，凡吾所以来，为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无恐……”秦人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，献飧军士。沛公又让不受曰：“仓粟多，非乏，不欲费人。”人又益喜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。（《史记卷八·汉高祖本纪》）

（明太祖入应天府，）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：“元政渎扰，干戈蜂起，我来，为民除乱耳，其各安堵如故，贤士吾礼用之，旧政不便者除之，吏毋贪暴，殃吾民。”民乃大喜过望。（《明史卷一·明太祖本纪一》）

不过人民二字尚觉空泛，一人绝对不容易得到全民的欢迎，但是至少必须得到最有势力的人的欢迎，孟子说：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章句上》）就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，巨室（土地贵族）最有势力。那末，秦汉以来，哪一种人最有势力呢？中国本来是个农业国，秦汉以来，又是个官僚国，而中国所以成为官僚国，

又由于农业国的生产条件而来。何以说呢？中国经济乃是闭锁的自然的农业经济，这种农业经济最容易产生割据的封建制度。但是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又不许割据局面的存在。因为中国农业的基础是筑在水利经济之上，这个水利经济只有集合各地，共同协力，而后才可成功。如果各地割据，只能在河流的一部，建筑坚固的堤防，而不顾到全流域，那末，在上流或下流还是要溃决的。溃决的时候，自然要影响到全河流。水利经济的破坏无异于破坏中国的农业。由于这个必要，遂成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。中央集权的国家要预防割据局面的复兴，不能不打倒土地贵族；既然打倒了土地贵族，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阶级，以组织官僚国家，这样，士大夫阶级就代替了土地贵族，而取得统治权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。因为中国是官僚国，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势力；因为中国是农业国，所以农民也有很大的势力，谁能够得到士农的欢迎，谁便可得天之助而为天子。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士农的欢迎呢？于此，我们又须研究他们两者的生活状况。

士人就是知识阶级，他们利用知识，以维持自己的生活，又利用知识，以取得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。他们维持生活的方法，或做师而取得一定的束修，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禄俸。若就普通的情形来说，士人都想做官。这种士人阶级产生于春秋末季。（在此以前，不是没有知识分子，不过他们生活非依靠于知识，乃依靠于土地的收入，他们做官非依靠于知识，乃依靠于门阀，所以他们与知识阶级不同）然在当时，士人阶级的人数尚少，他们做官容易，所以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门人未曾以“仕”为问题，而孔子亦不大言“仕”。到了战国时代，士人阶级已觉过剩，